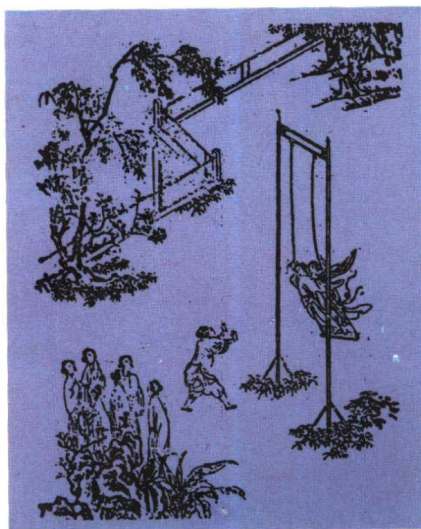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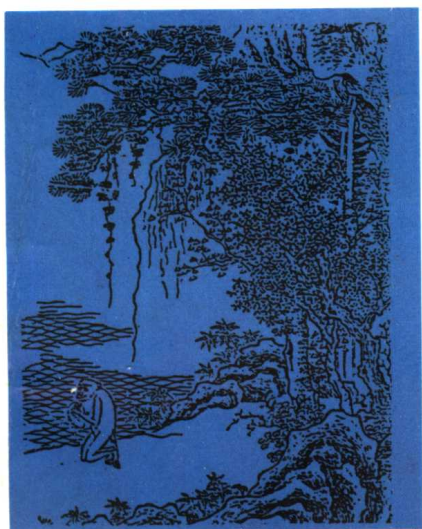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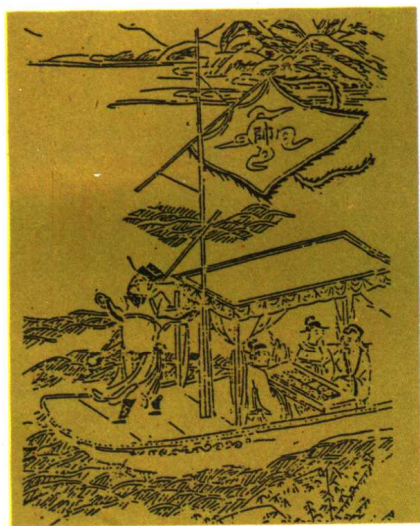


海外中国学丛书

#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美国] 浦安迪 著 ● 沈亨寿 译



#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美) 浦安迪 著

沈亨寿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6 号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美) 浦安迪 著 沈亨寿 译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5 印张 40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80037—261—8/G·134 定价: 13.00 元

## 《海外中国学丛书》序

季羨林

国内从事于西域南海古代文通史研究的老一辈的学者们，一定都还能记得，五六十年前冯承钧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法国中国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译文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当时中国学已流布全世界，但是在东方以日本为魁首，在西方则以法国为巨擘。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这两个国家以外，瑞典的高本漠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所激赏。英国的 A. Waley 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译文优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国学家，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些中国学家，对弘扬中国文化，加深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多半都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至今还为中国人民所阅读，所欣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外国中国学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又能超越我们呢？也许还有人认为，中国语言只有我们中国人最能掌握运用，其他国家的学者总不免有隔皮猜瓜、隔靴搔痒之病。不是有的外国中国学家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吗？不是也有外国中国学者把六朝隋唐时期习见的“诚如来旨”译为“诚然是我佛如来的旨意”吗？

这些都是事实，无可否认。我甚至还能举出更多的这样的例子。这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繁难。连我们自己的学者也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但是，总起来看，我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瑕不掩瑜。心理学家常讲一个现象：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住久了，住惯了，对他周围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反不如一个外来人，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事物特别敏感，他能一眼就看到别人不注意的现象。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够证明，心理学家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旁观者清”，也证明同一个事实。

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外来人”、“旁观者”。他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事物。

此外，还有一点，我也必须着重指出。就拿上面谈到的西域南海的研究来作例子吧。五六十年以前，我们对西域南海的研究水平，远远比不上外国学者。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多半不通；与这些地方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多半不能掌握。我们除了能读中国史料以外，缺的东西太多，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不通语言文字，不能掌握必要的资料，能读懂古代汉文典籍吗？因此，当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的时候，我们都由衷地感激他，法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的。这一套丛书，第一册出版于1932年，最后一册1958年出版，前后相距20多年。没有需要，能做得到吗？法国之外，日本学者关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翻译了不少，比如关于《大唐西域记》、《法显佛国记》等等的著作，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些译文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可惜好景不长，冯承钧先生之后，后继乏人，像冯承钧先生这样毕生勤勤恳恳，翻译不辍的“有心人”，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西域南海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连外国学者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自己有了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古话，到了今天

仍然是真理。如果多了解一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肯定会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的。我们翻译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部巨著，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外国人民对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巨大贡献的认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然而这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吗？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除了李约瑟的著作以外，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注意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几乎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名山事业。结果是某一些研究工作者视野不广，囿于成见，固步自封，难有新意。这当然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展开。每年都召开一些什么什么国际研讨会，专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多半是热热闹闹一阵，吃吃喝喝一番，长城、桂林、兵马俑，茅台、烤鸭，满面春风。即使留下几篇论文，也多半是应景之作，从中难以窥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之全豹，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深，也不能持久，对我们没有多大好处。

最近我给极受读者欢迎的《文史知识》提意见时，曾讲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史学界多注意外国同行们的研究动态，多阅读人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这个意见颇受同行们的重视。时至今日，我们提倡改革开放；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开放肯德基、米尼姆、卡拉O. K.、万宝路；可口可乐、T恤衫、耐克旅游真耐穿；而对人家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则漠然置之。我这个比拟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一般说来，真正埋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对卡拉O. K.之类，不一定有多大兴趣。我只不过想指出这种风气之十分不正常而已。

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的头脑会清醒一下的。全国人民，特别是学者们，都在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曾普照西方大地，全世界文化的发展皆蒙其利。这一点没有人敢予以否认。因此，现在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是绝对

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弘扬什么呢？又怎样弘扬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章法。有一位同行说了一句似乎是俏皮但实则含义深刻的话：“出口转内销。”他指的是，国外正在兴起一股研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的高潮，这一股高潮“波撼岳阳城”，也撼动了我们赤县神州。原来出口的东西又转销到国内来了。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我们应该竭诚欢迎，大力响应，这对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经常考虑在人类历史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发现，几千年以来，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迭兴替，互为补充，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19世纪初叶一直到今天20世纪末叶，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也不能万岁千秋。这个文化现在已经露出了不少破绽，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迹象已经萌出。西方国家，特别是那几个世界大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露出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兴趣渐浓。研究印度学的人，从历史语言的考证转向大乘佛教和佛教密宗；研究中国学的人，兴趣渐渐集中到《周易》、《老子》、《庄子》，以及禅宗的研究上来。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原因并不难找。西方学者中特别敏感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了点穷途末日之象，济之方无他：转向东方文化。

回看我们中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似乎还如凤毛麟角。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唤起大家的注意。唤起的方法多种多样，出版这样一套《海外中国学丛书》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它至少能起到当年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已经起过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能够互通声气；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真正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能改变一下当前这种闭塞的情况；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投石击破水中天”，能投出一块这样的石头。总之，

作用是很多很多的。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带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我个人认为，这是雪中送炭的工作，但又何尝不能理解为是锦上添花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希望。  
是为序。

1991.1.2



## 作者弁言

当拙作的华语版将要付梓的今日，我觉得应该附加一言以表达此际喜惧交集之感。我身乃异邦人，来胆大妄为的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化名作的管见，未免有所畏缩。尽管我从事学习中国语文早已年逾不惑，而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不如初学者之处。虽然如此，我所以冒昧提供本书在它们的本国出版以读中国朋友之目，只是因为本文中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的角度稍有出入，在下面试说明其一二点。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我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第二点，与治明清小说的国内学者稍微分歧的是，我硬取传统小说评注家的读法为首要的解释框架。虽然近年来大陆的中文研究界日益重视此等批评资料，而多半是用来探讨作者版本问题，仍不重视它们对小说本文含义的阐释。正如在本书序文里说明的那样，我认为这一批资料，连在最牵强离谱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因为那些评者本人原来属于四大奇书刊刻

行世时的看官听众，因此他们对小说本义的理解比我们异时异地的读者离得近一些。我幸而有机会驰骋在这些批评本之中，多蒙世界各地汉籍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的恩助。在细阅版本上的批语、序跋等文以寻绎书中言外之音时，常感到不谋而合的共鸣，使我这个局外人体会那种远方之朋幸遇同志师友的喜悦。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致谢沈亨寿老先生，他费了三年多的苦功成就本书的译稿。沈先生的翻译不仅确切流畅，而且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处处在英语拙作文理不明的地方竟窥透了原文未能讲通的本义。此外，他又详尽校勘了书中引录的各种研究资料，多处纠正原文内容上的错误。

与此同时，我也想乘此机会向徐朔方教授表达无穷的感激。徐先生对本书原来构思和成文曾有莫大的贡献，后来在中国发表译文一事也全赖他友好的斡旋。此外，在这书写作修改的过程中也曾经请教于多数国内外文研界的老师学友们，深恐拙作会污其芳名，所以不敢一一列举致谢。无论如何，本书有不少不足之处，无非是由于我本人知识不全，读法不对，在此只能垂首敬请中国朋友笑纳指正，以使我能实现一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愿。

1991年春

(原著者以汉语书写)

## 序

鉴于本书篇幅颇大，我想一开头先把自己的意图说一下。从实质上说，本书汇集了四篇研究中国明代所谓“四大奇书”的专著，给它的英语版只好起个颇为单调乏味的书名：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这些论文皆可独立成篇，分别作为对这几部作品的阐释，听任读者随意取舍。但全书也想提出一些争辩性的论点。为了不浪费读者时间，我想尽可能扼要地将其概述如下。

首先，我对这些“奇书”的见解是基于这么一个信念，即它们只有被看作是反映了晚明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思想抱负，而不仅仅作为通俗说书素材摘要时，才会获得最富有意义的解释。我相信，这几部小说的最完备修订本的作者和读者正是创作了独树一帜的明代“文人画”和“文人剧”精品的同一批人。所以，我不揣冒昧，也许是言过其实地把这些小说称为“文人小说”。

作了这样的交之后，我便想就下列几个特殊的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第一，我想证明，这四部作品以它们最成熟的面貌问世，标志着中国散文小说中一种新文体的崛起。我认为，这些作品尽管在主题和风格上大相径庭，可是在结构和修辞方面的一系列共同特征显示出它们的作者具有强烈的文类意识。虽然，时至今日，除了我把它用来作为本书书名的所谓“四大奇书”之外，还没有给这种文体一个更精确的标名。为了支持我关于这一体裁成型不早于16世纪的论点，我觉得有必要对每一部小说的成书和作者等问题的现有证据作一番详尽费时的概述。这种考证探究并非本书主旨，我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有何独特的发现，我之所

以试图综述这方面现况，只是想表明 16 世纪修订本对四大杰作的出现所作出的莫大贡献，并以此阐明它们对早先的说书材料作了何等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当然不是否定通俗故事本身和先行叙述素材在每一部作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只是为了强调说明，这一批新瓶也许比它们的老酒更有意义。

换言之，我想说明，在这里分析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只是意味着对各自的叙事系统作了最详尽的复述，而实际上是指一道以先前故事来源和通俗意象为素材，进行了主要是反讽处理的彻头彻尾的修改过程。按我的理解，反讽修辞术在明代小说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像稍后时期欧洲小说文体的情况那样，是一把具有两面刀锋的利刃：它一方面生产出一些主要用来削弱通俗文化对英雄人物的意象和褒贬偏情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树立某种正面形象的必要含义，尽管这只不过是正在崩溃的价值观系统所遗下的废物。在对这四部富有反讽色彩的杰作所表现的意义变化进行试探性分析时，我将尽可能把小说中所表达的观念跟明代思想史背景联系起来。这样，我便特别注意强调那些反映小说本质的“儒家”倾向性——尽管作品中实际表现的浅薄说教片段似乎完全是用佛、道两家术语来表达的。我将在最后一章总结性论述中设法论证这种说法是有益的。不过，届时我还想说明，这儿一些明显矛盾是无关宏旨的，因为我们在本书中要探讨的始终是构成晚明思想核心的折中论，这种人生观因其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情感而变得更为丰富，然而却从未脱离过当时文学修养和价值的儒家基石。

我坚持对小说进行的反讽阐释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尤其是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现代小说理论这一角度来分析作品的。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希望对中国作品的这种研究方法将不仅能使外国学者把这些作品泛称“novel”更名符其实，（我曾在别处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而且同时还可以拓宽“novel”这一术语的定义，使之能接纳非西方传统中类似的文学情况的范例。不管怎么说，本文所要分析的小说“奇

书”本身用不着以任何时髦的批评术语来为其证明价值。

然而我对明代小说杰作的处理另有一点需作说明。我必须承认，在研讨这些名文时妄自加上自己的批评见解一事不免有过顾虑，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一宗异邦的文化遗产。但我总是不断受到中国朋友和同行们的热情关怀，他们对一位异邦人来阐释本国文学丰碑所持的宽容态度使我的疑虑顿然消释。只要设想一下，在任何其他文化环境中，一位外国学者倘若敢于闯入他们文化遗产的圣地并妄加评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上述的慷慨精神就显得更为感人。

此外，还可以谈一下另一种原因，说明我为什么认为本文所提出的见解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陌生，这是因为我主要的启发和指导都得自中国的传统小说评注家。他们的批注附随着不少明末清初小说名著的精刻版本。只因为这些评论家常犯言过其实、各执一词的弊病，近代学者往往把他们的见解摒弃于严肃的小说研究之外。但我相信，这些批评资料的系统运用至少有两大理可以为其辩护：第一，尽管这种批评常多主观臆度和偏颇离谱之处，但它们的中鹄率与现代批评家的成绩相较，毕竟犹胜一筹。更贴切的一点是，这些评论纵然有精有粗，都使我们得以窥见这几部奇书对当时的看官听众，即16—17世纪的文人读者，所表达的原意。

我得益于早期中国的评注家们，正如我受惠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即把著名通俗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课程的老前辈以及大批近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第一章能够写成，完全是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鼎力相助的结果。他在1983—1984学年间作为卢斯研究员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帮助我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嘉靖和万历文学的研究生讨论班。我也深深感谢北京的吴晓铃教授慷慨相助，让我分享他的博学宏文，并为本书亲笔题写了书名。在我这里近处，我的研究显然受益于夏志清、韩南（Patrick Hanan）、柳存仁、雷威安（André Lévy）、芮效卫（David Roy）等国外人的著作，他们从根本上创建了西方研

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领域。此外，还有无数老师、学生、同学们在我写作此书过程中都有过莫大帮助，不能一一举名，只好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1986年6月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 目 录

《海外中国学丛书》序 .....	(1)
作者弁言 .....	(1)
序 .....	(3)
第一章 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	(1)
注释 .....	(30)
第二章 《金瓶梅》——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 .....	(41)
注释 .....	(130)
第三章 《西游记》——“空”的超越 .....	(149)
注释 .....	(200)
第四章 《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 .....	(239)
注释 .....	(293)
第五章 《三国志演义》——义士气概的局限 .....	(318)
注释 .....	(402)
第六章 对“四大奇书”的理学阐述 .....	(447)
注释 .....	(461)
译后记 .....	(463)

## 第一章 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自弘治(1488—1505)至万历(1573—1619)中期左右100多年间——即大约相当于西历16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四部作品开始以它们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这四部书——《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经过后来某些修订,就成了我们今天阅读的同名小说。<sup>(1)</sup>在构成本书主体的逐一详细分析中将会表明,这四部16世纪的版本没有一部属于崭新的文学创作,而是都经历了对原始素材、先行故事和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本书的首要论点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四部16世纪版本都代表了这一演化过程的最重要阶段,即标志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并将各自的故事内容提高到了自觉进行艺术构思的水准。基于这一认识,我的论述便可依循这样一条思路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对这些特定版本进行最详尽的研读和阐释,至于这些作品的其他文本,则只能归之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般文献资料而已。

上述这四种修订本一问世,便立即成为随后长篇小说(国外汉学通常称作传统中国的“novel”)发展的范本。事实上,我还可以进一步宣称:正是这四部书,给明、清严肃小说的形式勾划出了总的轮廓。这四部作品构成小说文类本源的重要地位,恰恰由于作品本身的卓越超群而有点被人忽视,因为它们的无比丰富内容和精巧绝伦的写作手法,同类作品中很少有能与之媲美者。因而,这四部“奇书”在一个半世纪里一直鹤立鸡群,自成一体,直到《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问世之后,才形成所谓“六大古典小说”<sup>(2)</sup>

不过,即使在18世纪以前后面两部杰作尚未出现之时,那前四部奇书的特殊地位也已得到理所应得的承认。例如,李贽把《水浒传》列入所谓“五大部文章”之内,金圣叹也把《水浒》列



为“六才子书”之一。<sup>(3)</sup>到了清朝初年，书贾们照例把这四部小说的刊印本标为“奇书”；就连后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些次要作品也冠以同样的名称时，他们依然暗示这原先的四部书已提出了用来衡量所有其他同类作品的标准。最后，“四大奇书”便成了一个惯用术语。我不敢肯定这个词语形成的确切时代，但至少早在17世纪刘廷玑写《在园杂志》时就已经用它了。托名“李渔”评点的《三国志演义》序文中也用了这个词语（该序文认为是冯梦龙首创了该词语）。<sup>(4)</sup>到乾隆年间，它似乎已被芥子园刻书坊（它原先与李渔有关）用作一套名为“四大奇书”的小说集的名称。从那时起，它一直沿袭至今，成了一个颇为通行的名称。<sup>(5)</sup>

在提出主要应归功于这四部奇书的16世纪版本（而不是先前或后来的版本）、它们将各自的故事和版本系统改造成为文学丰碑这一问题时，我必须遵循几个思路去加以论证。首先，我将在每一章里论述各个论据，从而设法阐明这些特定版本比它们据传的或现存的早期资料确实有重大的改进。然后，我将对这些文本的结构和修辞进行详尽的分析，以证明它们在行文上如何错综复杂、艺术手法上达到何等精湛的程度。一旦完成了这项基础工作，我就将转向全文的细读和阐述，并设法把这种阐释与当时的某些特定思潮联系起来。

但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先把这种讨论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下，尽可能深远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也许是有益处的：为何恰恰在此历史时刻，中国长篇虚构叙事文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除了贪图方便，显然没有理由非得固执用“世纪”这一时间框框不可，以朝代纪年的中国传统方法也同样不一定能标出一个个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我们可以选用一种不太严密的名称，把该时代简单称作“晚明”，或者也可以集中在几个文人世代，就像某些学者最近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人们也许宁可超越明、清换代的界限，而把目光转向一大段的文化历史，譬如把1500年至1750年视为更有意义的参考标架。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这首章中说明：从1500年到1600年，正跨越着这四大奇书流传的100年左右，恰